



評論
tly

同心落實香港五年規劃 行政立法共啟新篇章



議事
論事

李慧琼

行政長官上月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香港發展歷程的里程碑。這份規劃既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重要部署，也是特區由治及興、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行動綱領。

制訂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第一步，標誌着特區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意義重大。在時機上，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亦同步展開香港五年規劃，說明了香港正在借鑒和運用國家治理的成功經驗。在規劃上，香港五年規劃將中長期的藍圖與年度施政報告緊扣，令本港規劃從短期，走向長遠布局。五年規劃又與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三者並行，加強政策的穩定性，為市民、企業和市場提供更穩定的未來預期，增強各界信心。

放眼長遠布局 回應發展所需

香港五年規劃訂立五大目標，包括經

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更以「四中心、一高地」建設成為推動香港發展的核心，北部都會區提速發展更是重中之重。這些目標正好回應到香港當前最迫切的需要，將「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有機結合，把「國家所需」和「香港所長」精準對接，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令我們的產業結構更多元化，增強我們應對全球變局、地緣政治挑戰的韌力。

在下一階段，立法會作為特區管治團隊重要一員，必須在行政主導下積極協助政府將五年規劃各項目標，轉化為市民看得見、觸得到的政策成果。

早在規劃籌備期間，立法會已發揮市民和政府之間雙向橋樑作用，透過行政長官破天荒設立政府與立法會協同研究及意見收集機制，立法會議員總動員，按界別、專業和實務經驗成立六個專題組，分別深入不同界別和社群廣泛納民情民意，短短一個月收集了近600份建議書，把社會真實

聲音帶入政策形成過程。今年5月，立法會向行政長官提交題為「助力特區政府，做好五年規劃」的專題研究及意見收集報告。如行政長官所言，立法會的研究和報告為政府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施政報告更吸納了大量來自議員和政黨的建議，反映立法會不僅是監察者，也是建設者、參與者和推動者。

五年規劃公布後，立法會的工作不會停止，反而進入更關鍵、協助政府落實的階段。剛在上星期，立法會一連三天對香港五年規劃和本年度施政報告的相關議案進行辯論，議員就鞏固提升香港競爭優勢、加快北都建設、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完善民生保障，以及統籌發展和安全等多方面，積極建言獻策，政府官員亦正面回應議員的真知灼見，並表示會相應跟進。

此外，立法會相關委員會正處理《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議員又先後三度前往北都進行實地考察，了解產業發展、河套香港園區及大學城等用地規劃，以及北都生態保育等；立法會亦已通過了多項與北都建設及產業扶持相關的撥款建議。

這些工作都是希望為北都發展「拆牆鬆綁」，並提供所需要基礎，以加快推进北都建設，促進產業集聚與區域融合。

連結社會 提升透明度

作為「民意代言人」，本屆議員又加大力度連結社會各界，至今所有議員均已開設業界或地區辦事處逾200間，亦已完成上任半年的工作報告並上載至立法會網頁供市民參閱，向公眾匯報主要工作成果。議員將繼續透過會議質詢、法案審議、財務審批、事務委員會討論、地區聯繫和界別溝通，監察和促進政府把規劃的願景轉化為具體政策、項目和成效。

同時，立法會亦會積極推動社會各界正確認識五年規劃的戰略意義。規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不斷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讓市民在國家和香港高質量發展中共享成果。它關乎青年能否有更廣闊的上流空間，企業能否找到新增長點，家庭能否改善居住和生活質素，長者能否獲得更完善照顧，以及香港能否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因此，議員既要把握民意帶給政府，也要把政策講清楚、把機遇講明白、把信心帶到社區，這亦有利各項政策或工作順利推進。

展望未來五年，香港面對的外部環境仍然複雜，同時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國家持續推進高質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深化，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都為香港帶來更廣闊的舞台。只要我們堅守「一國兩制」根本制度優勢，發揮普通法、國際化、自由港、專業服務和中外融通的獨特功能，香港必能在服務國家中成就更好的自己。

我衷心希望和鼓勵香港社會各行各業，在各自崗位上發揮團結協作、務實有為的精神。工商界要敢於投資創新，專業界要貢獻智慧方案，青年人要胸懷家國、放眼世界，地區和社福團體要繼續守望相助，政府與立法會更要同心同向、共同擔當。讓我們以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為新起點，凝聚全社會力量，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讓廣大市民共享國家高速發展的紅利，共同開創香港由治及興的新篇章。

立法會主席

宏福苑簽約最後召集：專隊同行暖人心 釐清業權莫遲疑



議論
風生

陳曉峰

宏福苑業權收購工作已步入最關鍵的「最後一里路」。距離10月15日簽署買賣協議的最後截止日期僅剩數天，這是落實補償金額、鎖定後續安置與選樓資格的決定性分水嶺。在這最後衝刺階段，筆者既欣慰於前線支援團隊的貼心付出，亦為少數仍受困於業權問題的街坊感到焦急，特此再次撰文呼籲，盼全體業主認清時限、把握良機，順利跨過最後門檻。

一、專隊貼心同行釋疑慮 繁複程序毋須心驚 物業買賣牽涉嚴謹繁複的法律條文與合約程序，對不少年長居民而言，踏入律師樓面對厚疊疊的法律文件，難免感到心理負擔與不安。值得高度肯定的是，政府安排的「解說專隊」在此關鍵時刻展現了極大的耐性與同理心。專隊成員不僅事前逐一向街坊詳細拆解合約條款，更主動陪同業主及有需要的居民前往律師樓辦理手續。在整個簽約過程中，律師與專隊成員做到化繁為簡，以通俗易懂的日常語言，逐條剖析權益與責任，耐心釋除業主心中疑慮；同時又做到有效安撫情緒，專隊全程在旁照應陪伴，讓老人在熟悉、安心的支援下放心落筆，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暖心同行」。

筆者在此想向仍有顧慮的街坊進一步說明：法定程序是為了保障雙方合法權益而設，背後更有專業團隊全程護航，大家切勿因畏懼手續繁瑣而卻步。

二、業權須主動釐清 律師僅能協助難完全代勞

然而，在整體進度向好的同時，目前仍有極少數單位的業主面臨「業權未釐清」的瓶頸，例如涉及尚未完成的遺產承辦（申領遺產授予書）、授權書效力存疑、家庭成員聯名持有欠共識，抑

或物業契據有所缺失等。

筆者作為法律界人士，必須向這部分受困業主發出切實而懇切的提醒：律師角色是「指引協助」，而非「代辦全責」。律師團隊固然能提供法律諮詢與程序指引，但家庭內部的遺產繼承申請、親屬授權書簽署、共識凝聚及證明文件搜集，始終必須由業主與其親屬親力親為、主動推進。律師無法代替當事人達成家庭協議或代行法定申辦。

此外，完成收購程序需時，時間絕對不等人，釐清業權往往涉及法庭遺產承辦處的審批或政府部門查核，每一步驟均需時日。政府已盡一切努力縮短所有行政程序，若業主不及早行動、加快辦理，一旦跨過10月15日的最後截止日期，買賣協議將無法如期訂立。隨之而來的，不僅可能痛失自願收購機制下的特惠補償條款，更會錯失優先選樓的黃金資格，而且一切後果都須由業主自身承擔。

三、把握黃金窗口 齊心跨過終點線 政府推出全方位的長遠居住安排，旨在徹底協助居民重過新生、重建社區。如今前線專隊的陪伴與專業律師的協助已為大家鋪平道路，只待各位街坊邁出最後決定性的一步。

面對10月15日最後截止日期，對於已具備簽約條件的業主，筆者呼籲切勿再作觀望，盡快在解說專隊陪同下前往律師樓完成簽署；而對於業權尚待釐清的業主，筆者呼籲務必與時間競賽，即刻聯絡律師及專隊尋求合適途徑，盡速辦妥家庭內部授權與法定證明文件。

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的猶豫與拖延，最後都只會損害自身權益，願全體宏福苑居民齊心協力辦妥手續，昂首邁向安全、舒適的美好新生活。

立法會議員



議事
廳

鄧飛

新皇崗口岸昨日清晨6時30分開通啟用，港深兩地迎來基礎設施互联互通的歷史性時刻。這座承載着無數港人集體回憶的「老口岸」，經過歷時7年的重建實現華麗轉身，不僅標誌着港深協作邁上新台階，更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大動能。

皇崗口岸於1989年啟用，原本是為了應付龐大的跨境貨運而建，隨着兩地人員往來日益頻繁，皇崗口岸逐漸增加了客運功能，並於2003年實行了24小時通關，成為深港經濟起飛年代的超級大動脈，也是深港之間唯一全天候開放的客運陸路口岸。皇崗口岸的重建，是深化深港交通互联互通的重要項目，其開通亦配合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部署。

過去兩個多月，特區政府在港方口岸區進行了超過一百次系統測試與各類應急演練，包括分別涉及1萬名和2萬名公務員的兩次大型壓力測試。新皇崗口岸會採用嶄新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符合資格並完成登記的旅客使用自助通道，只需排一次隊、檢查一次證件、核實一次身份即可過關，旅客整體通關時間由原來約30分鐘縮短至最快5分鐘。跨境車輛採用「聯合一站式」模式，司機一次過完成深港「五方查驗」，通關時間由原來約10分鐘，縮短至僅需約2分鐘，較以往節省八成時間。

對接國家規劃部署關鍵一步

站在更宏觀的視角來看，新皇崗口岸的啓用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部署的關鍵一步。它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以及兩地民眾「心聯通」的重要載體。極速的通關體驗打破了地理與制度的隔閡，讓「一小時生活圈」變得更加觸手可及，極大地便利了兩地居民跨境工作、就學與生活，進一步打破人才流動的壁壘，釋放出深港兩地在金融、科技、專業服務等領域產業協同的巨大潛力。

其次，新口岸的啓用對兩地城市規劃與經濟轉型具有深遠的戰略價值。隨着新口岸實施「一地兩檢」

並將查驗設施集中於深圳一側，香港落馬洲管制站原址將得以騰空，這意味着香港將釋放出約20公頃的珍貴土地資源。在香港積極推動經濟轉型與創新科技發展的當下，這片土地已被正式納入「新田科技城」的宏大規劃之中。這20公頃土地將與鄰近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為兩地的創科產業、實驗室建設及高端人才住宿創造了極為寶貴的發展空間。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皇崗口岸開通儀式上指出，口岸開通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體現落實國家規劃。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加快建設國際一流灣區。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要促進跨境人員往來，提升口岸通關效能。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開通，是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具體行動。

第二，實踐制度創新。新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是港深之間首個採用創新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的陸路口岸，新的模式將會大幅提升通關體驗和效率。

第三，促進跨境流動。新的皇崗口岸是港深之間最重要的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為兩地人員往來開拓更廣闊空間。隨着香港與深圳的交通聯繫進一步加強，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將會更高效流動，進一步推動大灣區深度融合。

實現兩地城市治理雙贏局面

新皇崗口岸取消了原有的貨運功能，轉型為純客運樞紐，這不僅有助於改善口岸周邊的環境質量，更有望舒緩深圳福田市中心長久以來的交通擠塞問題，實現深港兩地城市治理的雙贏局面。

新口岸開通的一刻，穿梭落馬洲與皇崗近30年的「皇巴」亦完成其歷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公共交通網絡，以及極速通關的現代化科技。新口岸不僅見證了深港兩地的時代變遷，更翻開了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共創繁榮的嶄新篇章。隨着昨日清晨第一批旅客的步入大樓，新皇崗口岸正式啟航，成為香港特區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東西方關係發展的變與不變



國際
關係

宋魯鄭

2017年12月，特朗普發布任期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第一次在官方層面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不僅給中國貼上「修正主義國家」標籤，還指責中國試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利益與價值相悖的世界，取代它在亞太地區的地位。這是美國對華戰略從「接觸」轉向「競爭」的轉折點。即使此後政黨輪替，競爭的重點會有變化，但這一戰略並未改變，雙方在經貿、科技、人才、價值觀、地緣政治等領域激烈博弈。

2019年3月，歐盟發布《歐盟—中國戰略展望》，第一次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對手」，認為中國在推廣替代性的治理模式。實質否定了2003年達成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自此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並大有中歐關係中美化的趨勢。

美、歐幾乎同時對華政策轉向，當然不僅僅是跨大西洋政策的某種協調，本質上是東西方關係的真實反映。其根源有二：第一，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減少。

決定大國關係的是彼此的戰略利益，這主要體現在安全層面。冷戰時，雖然東西方文明差異很大，價值觀更是南轅北轍，

經濟交流更幾乎為零，但歐美卻相繼對華伸出橄欖枝：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5年中歐建交。因為各方有共同的安全威脅，蘇聯。但蘇聯解體之後直到現在，雖然東西方仍然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如核不擴散、反恐、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控乃至最新的人工智能風險，但都不是共同的戰略利益。全球各國都面臨這樣的挑戰，而非東西方專有。

第二，雙方的國家利益有戰略關係衝突。

大國之間即使沒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但只要沒有戰略關係衝突，仍可相安無事，並不會視對方為對手和威脅。冷戰結束後直至2017年，東西方就處於這個狀態。根本原因在於西方國家認為中國還構不成對西方的挑戰，再加上西方在實力的支撐下自信滿滿，不僅認為它可以通過接觸改變中國，還認為這是借全球化把自己的實力迅速轉化為切實的利益和權力。這也是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大行其道的原因。

經濟關係從互補轉向競爭

當然中國是一個和平的文明，其經濟還停留在產業鏈的中低端，和西方可以形成互補，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但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歐美深陷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大大改變了雙方的實力對比，也由此出現了戰略關係衝突因素。

美國從其文化和歷史經驗來看，認為中國強大之後必然尋求霸主地位，必然在亞洲成為主導性國家，這是對它國家利益最大的戰略威脅。於是從2011年開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計劃到2020年把60%的海軍艦艇、60%的本土以外空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到後來完全放棄接觸政策轉向遏制。

雖然美國同樣面臨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從互補轉向競爭，但並非中美交惡的主因。歐洲由於不再是世界霸主，且和中國相隔遙遠，它和中國的戰略關係衝突與美國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歐洲更希望捍衛西方的統治地位和制度模式。這除了西方中心論之外，也因為今天歐洲的國際地位更依賴軟實力和規則。它認為中國的成功必然會提供一個替代方案：即中國在治理模式、經濟體系和發展道路方面向世界提供其他選項，從而在全球範圍內挑戰了歐盟的利益、價值觀和影響力。從根本上講，它無法接受一個中國佔居主導地位的世界。

二是隨着中國不斷向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邁進，雙方的經濟關係從互補轉向競爭，同時雙方的貿易不平衡達到其難以承受的程度，歐盟大多數成員對華逆差。雖然這根本上是由於歐洲自身競爭力下降造成的——成本高、效率低、創新能力弱，但後果卻可能摧毀歐洲的工業基礎，並嚴重衝擊歐洲的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由於歐洲不追求霸權，因此經濟利益的戰略性要高於美國。

以上這兩大因素，使得歐洲認為西方面臨的極右民粹主義崛起、經濟困境都和中國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特朗普崛起是美國內部和中國這個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歐洲極右政黨的崛起也是如此。

三是俄烏衝突。歐洲視俄羅斯為當下最大地緣政治威脅。但俄羅斯卻是中國唯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國，是對抗美國遏制最重要的力量。中國不可能為了歐洲而放棄俄羅斯。因此中國的中立立場——這也是新興國家的共同立場——就令歐洲難以接受。

當然僅就中歐之間，還有兩個因素也助推雙方走向對立。一是美國因素。歷史上看，中美和中歐關係有正相關性，中美關係好，中歐關係也好，中美對抗，中歐

也會亦步亦趨。二是台灣因素。歐洲密集打「台灣牌」是2019年確立中國為「系統性對手」框架之後的事。由於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因此在惡化中歐關係上作用突出。

差異化處理與歐美關係

不過中國對待歐美是有差異的。對美國毫不猶豫以打促談以談促和。對歐洲則立足於能談就談，以談判和合理的讓步來化解問題，以穩住雙邊關係。雙方於10月在北京就貿易摩擦達成階段性共識就是如此。原因在於中美戰略博弈是主要矛盾，中歐是次要矛盾，歐洲儘管不可能站到中國一邊，但和中國維持門而不破的關係、和美國保持一定距離還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歐關係衝突的性質和烈度與美國也不同。美國是要阻撓中國發展，全方位遏制，歐洲則更傾向於維護自身利益，聚焦具體問題。

歷史上看，東西方多次為友也多次成為對手，今天的狀態也不會長期持續，只要上述因素發生變化，雙邊關係自然隨之改變。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